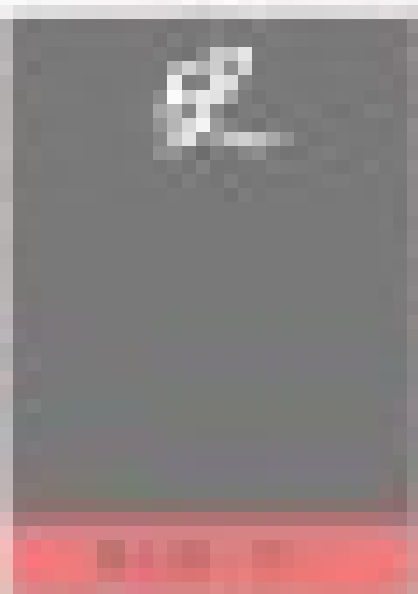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史

第七冊·傳二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HONG K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国史·共 10 卷/朱汉国、杨群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

ISBN 7-220-07007-1

I. 中... II. 朱... III. 中国-近代史-民国
IV. K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8239 号

ZHONGHUAMINGUO SHI

中华民国史 (第七册)

主 编 朱汉国 杨 群

本册主编 郭大钧

责任编辑	李洪烈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叶 勇 伍登富
责任印制	丁 青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30.75
字 数	5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220-07007-1/K·1036
定 价	1380 元 (全 10 册)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028)87071239

本 册 目 录

于右任		(1)
卫立煌		(6)
马占山		(14)
王正廷		(17)
王世杰		(24)
邓演达		(29)
孔祥熙		(34)
龙 云		(40)
卢 汉		(46)
叶楚伦		(53)
白崇禧		(58)
冯玉祥		(62)
朱家骅		(69)
朱培德		(74)
刘 峙		(79)
刘 湘		(83)
刘文辉		(89)
汤恩伯		(95)
许崇智		(100)
孙 科		(106)
孙连仲		(112)
杜聿明		(118)



杨永泰	(123)
杨虎城	(128)
李宗仁	(135)
李济深	(139)
吴忠信	(144)
吴铁城	(148)
吴鼎昌	(154)
吴稚晖	(160)
何成浚	(165)
何应钦	(170)
何香凝	(175)
余汉谋	(180)
邹 鲁	(184)
宋子文	(188)
宋庆龄	(197)
宋哲元	(203)
宋美龄	(210)
张 继	(215)
张 群	(219)
张发奎	(225)
张自忠	(231)
张学良	(238)
张治中	(246)
张静江	(251)
陈 仪	(256)
陈 诚	(261)
陈友仁	(268)
陈布雷	(274)
陈立夫	(280)
陈果夫	(287)
陈济棠	(292)
陈铭枢	(297)



邵力子	(302)
林 森	(308)
居 正	(312)
罗文干	(316)
胡汉民	(321)
胡宗南	(328)
顾祝同	(335)
顾维钧	(340)
郭泰祺	(346)
唐生智	(352)
徐永昌	(359)
黄 郛	(363)
黄绍竑	(368)
盛世才	(373)
阎锡山	(379)
商 震	(387)
蒋介石	(392)
蒋方震	(408)
蒋光鼐	(414)
蒋廷黻	(418)
蒋作宾	(424)
蒋梦麟	(430)
韩复榘	(436)
程 潜	(441)
傅作义	(446)
蔡廷锴	(451)
谭延闿	(456)
熊式辉	(461)
颜惠庆	(467)
薛 岳	(472)
戴 笠	(479)
戴季陶	(485)

于右任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以字行。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太平老人等。祖籍陕西泾阳县。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一贫寒家庭。1881年，生母赵氏病故，遂跟随伯母房氏生活。于右任在伯母的抚养下，7岁入私塾，师从第五（复姓）先生。11岁随伯母迁往三原东关，跟当地有名的塾师毛先生（班香）学习。在这里，他不仅学习了经史、诗文，而且还跟随毛班香之父毛汉诗学习草书，使得后来他的草书闻名于世。

1895年，赵芝珊任陕西学政，适逢岁考，于右任考了第一名，名列三原县榜首，成为县学附生（秀才），得到了毛先生的赞许。1897年，“学已小成”的于右任告别了培育他9年的毛班香先生，进一步从师深造。他先后就读于三原的宏道书院、泾阳的味经书院和西安的关中书院。

1898年，叶尔恺出任陕西学政，当时提学使的衙门设在三原。叶到任后，出了几十道考试题让秀才们去做。于右任在“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的情况下，勉强做了一些试题交了上去。结果却出乎意料的得到学台的赞赏，认为于的诗文策论，见识襟度，卓尔不凡，并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是“西北奇才”。

随着知识的增长，于右任的视野也开阔了。当他看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政府腐败无能，只知道一味割地赔款，搜刮民脂，使三秦大地民不聊生后，萌生了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思想。于是，他写诗抨击时政，言人之所不敢言，咏人之所不敢咏。

1900年，于右任在陕西中学堂求学，时值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

后和光绪皇帝狼狈逃到西安。他出于义愤，写了许多忧国忧民、谴责清廷的诗篇。后来，他将这些诗汇集成册，取名《半哭半笑楼诗草》，在友人的帮助下，于1903年出版。在诗集的扉页上，他自题对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结果，他的言行激怒了清朝统治者，陕西巡抚以“逆臣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等罪名上奏清廷。1904年春，清政府下令通缉于右任：“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正在开封参加会试的于右任，在友人帮助下，虎口脱险，逃往上海。经人介绍，于右任得到了震旦学院监院（校长）马相伯的帮助，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化名“刘学裕”。

1905年初，为抗议外籍教师干涉震旦校政，于右任与其他同学集体退学。不久，他帮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1月，他又与王敬方等人创办中国公学，以收留因清政府背信弃义致使许多无法在日本继续学业的回国留学生。同时，他还兼任两校的国文讲习。

为了创办报纸，于右任于1906年离开上海来到日本考察新闻出版事务。在东京，他拜见了神交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并正式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十分赞赏他的才华和学识，委任他为长江大都督，让他担负中国中部革命的重任。同时，豫晋秦陇四省旅日同乡同学会还推于任会长。

1906年底，于右任返回上海，时值《苏报》被查封不久。为了同清政府作斗争，他于1907年2月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以期再造神州，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不幸的是该报社被一场大火烧掉。这次发生的意外没有影响他办报的热情。1909年，他又创办《民呼日报》，其宗旨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其言论比《神州日报》更为激烈。清政府借口将其逮捕入狱，后虽获释，但报社被迫停刊。两个月后，《民吁日报》又创刊了。由于该报宣传反日思想，日本驻上海领事勾结清政府地方官员，判令于右任永久停办刊物。几个月后，《民立报》又问世了，这是于所办的第四份报纸，影响也最大。他通过该报发表大量的文章，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无能，致使列强肆意侵略，主权沦丧。《民立报》报馆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在上海秘密活动的主要据点，被誉为“长江流域革命之中枢”。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在任期间，他曾开办沪宁夜间班车。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也辞去职务，回上海继续主持《民立报》。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他怀着对黑暗势力的义愤和对友人的思念，写出了词恳意切的《宋渔父先

生遗事》等文章，追述宋一生的革命业绩。他称宋“是好男人，是大英雄”，“所僵卧者，裹创之躯体；而不泯者，概世之英风”。同时，《民立报》连续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并将其内幕公之于众。这些宣传，有力配合了当时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被迫停刊，于只好东渡日本。

1914年，于右任悄然回国，在上海以卖字维持生计。他曾秘密派人潜入陕西，策划讨袁事宜。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仍把持北京政权。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1917年5月，于主动向孙中山建议，从北方着手，突破北洋军阀势力的核心，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在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他由北京经洛阳入西安，秘密联络革命志士井勿幕、张钫、胡景翼等人，准备在陕西发动起义。不久，他返回上海。

1918年1月，胡景翼、曹世英等人在三原成立靖国军，准备反抗依附于北洋军阀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并邀请于右任回陕。8月，于回陕后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在三原誓师，讨伐陈树藩。在就职大会上，于说道：“我从上海回到陕西，给大家带来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枪炮子弹，而是一腔热血和不怕死、不畏难的革命精神。”

于右任担任总司令后，整编军队，严明军纪。不到3个月，各地民军竞相投效，使靖国军达到3万余人，是辛亥革命以来，陕西革命势力的鼎盛时期。在靖国军任职的4年间，尽管遇到重重困难和种种矛盾，于右任仍坚持带领军队同周围各省军阀势力相抗衡。1922年，由于靖国军内部分裂及敌人的诱降而宣告失败。于再度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也因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回到上海。

1922年春，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10月，该校改组为上海大学，学生驱逐了原来的校长，欢迎有革命声望的人士主持校政。学生代表经过酝酿，共同推举于右任为该校校长。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广州国民政府还拨专款资助学校，此外，学校的财政“全恃于右任在国民军方面募款维持”。于还通过李大钊邀请共产党人到学校任职。如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等。中共中央还先后派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施存统等到上海大学任教。上海大学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革命人才方面卓有成效的一所大学。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于右任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赞同国共合作。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

变”，邀请孙中山进京。年底，孙中山北上，于随孙中山入京。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于右任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1926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不利，西安告急，李大钊建议于右任赴苏联敦促冯玉祥回国。于右任秘密经天津到上海，在上海乘苏联轮船经日本到达海参崴。7月，他在莫斯科见到冯玉祥，经过他的说服，冯决定立即回国。9月，两人抵达绥远的五原镇。五原誓师后，于右任被任命为国民革命联军陕西总司令。他主持召开了乾州会议，商讨攻打西安对策。1927年春，他指挥国民革命联军攻下西安，将刘震华部驱逐出陕西。

1927年郑州会议后，于右任随汪精卫、孙科等人回武汉，后去南京。1928年，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主管财务审核。1927—1929年间，陕西连续3年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灾荒之严重为数百年所罕见。于右任得知此事后，“本拟早日回陕看视灾情，因足疾未能成行”。为实现其“久抱与家乡父老生同生死同死的宗旨”，1928年8月，足疾尚未痊愈的于右任风尘仆仆回陕视察灾情，慰问灾民。面对陕西财源枯竭，储粮殆尽的境况，他奔走于东南各省，开展募捐活动。

1930年11月，于右任再一次回陕，此时，陕西大灾之后农业亟待恢复。为了改良农业，培育农业科技人员，他用自己的祖遗之地300亩和购买的900亩地，创办斗口农场，聘请农业专家任场长，并立碑文：“我去世后，农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

1931年2月2日，于右任就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就任后，他主要从事制定监察制度、划分各个监察区等工作。11月，复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深知亡国痛苦的于右任忧心如焚，亲自去找蒋介石，要他“快拿主意，回击日人”。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于右任和冯玉祥等爱国人士提出立即对日宣战，以雪国耻。

为兴办西北教育，开发大西北，于右任、邵力子、杨虎城等人经过筹划，于1932年兴建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农业院校——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易名西北农学院），并兼第一任校长。1933年，监察院因弹劾铁道部部长顾孟余购买国外器材有舞弊之嫌，招致汪精卫的不满，汪提出补充办法以限制监察院权力，于右任一怒之下拂袖回陕。

于右任的书法卓有成效，其风格自成一家。1932年，他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研究社，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他经常邀请一些书法

爱好者，广求列代草圣遗迹，从事于草书的研究整理。他的草书以“易识、易写、美丽、标准”为四大原则。经过大量的整理工作，1936年编订《标准草书》。在自序中，于右任写道：“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约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于右任从南京亲赴安徽、江西、湖南、汉口等地巡慰，并发起组织《民族诗坛》刊物，以诗歌的形式宣传抗日。年底，蒋介石邀请他去其住处，征询抗战意见，于说：“抗战到底者，就是能打要打，不能打也要打！只有打，才能胜利，也必能胜利！”蒋介石听后严肃地说：“我了解于先生的意思了！”

1938年，于右任组织监察委员赴战地视察，以身作则，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他坚持抗战，反对内战。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于右任在国民党中央电台先后作了《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和《以民族正气扑灭汪逆》的广播演讲。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于右任在官邸设午宴款待。席间，二人讨论时局，漫谈诗文。于盛赞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很有气势，催人进发。他还明确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和平，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1947年初，正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于右任因忧国事而长夜不能入睡，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歌》以表达其企盼和平的心情：“群众无声胜有声，杜诗重读不胜情。太平老人磨铁砚，垂老还期致太平！”1948年，蒋介石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有6人参加副总统竞选，于右任是其中之一。第一次投票结果，于右任列第四名，但很快，他退出竞选。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时，于右任在国民党的胁迫下飞往上海，在上海徘徊数日后到达广州。11月29日，于右任飞往台湾，居住在台北青田街9号。从此，他与夫人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天各一方，开始了孤独的生活。

于右任一生写了许多诗，并出有诗集。早年所写的诗主要表达他爱国忧民的心情，晚年所写的诗大多反映他思乡的愿望。每年的重阳节，他都邀请一些从大陆来的诗书老友聚会，或赋诗，或叙旧，或登高北望。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于台北，终年86岁。

（康之国）

卫立煌

卫立煌（1897—1960），字俊如，又名辉珊，1897年2月16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城东卫杨村。祖父是个农民，父亲卫正球曾在合肥县衙当差，因无钱在官场应酬，被挤掉了饭碗。尽管家境贫寒，卫正球夫妇还是让三子卫立煌上了几年私塾。1911年，合肥地方流行瘟疫，卫正球与他的二儿子夫妇相继死亡，卫家生活更加困苦，卫母宋氏因此哭瞎了眼睛。

武昌起义爆发后，年方15岁、在村里读书的卫立煌剪去辫子，响应招募，到庐州军政分府里当兵。不久庐州军政分府解散，卫立煌随大哥立炯（字朗如）投奔和州，参加了保卫和州的战斗。由于众寡悬殊，和州保卫战失败。

卫立煌看到家乡革命受挫，壮志难酬，于1914年秋只身来到武汉。适逢湖南军队在武汉招收学兵，卫立煌就进入了学兵营。在这里他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到了基本军事知识，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军人打下了基础。

1916年，卫立煌来到广州，投入粤军，被推荐到孙中山的卫队里，有机会听到孙中山宣传革命思想，在他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升任警卫团排长。1918年，卫立煌调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因屡立战功，不断升迁，到1921年10月，卫已升任团长之职。在他22岁当营长时，为了装扮老成，特意蓄起了一撮胡须，成为卫立煌外貌一大特征，历时30载。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卫立煌任东路军第十四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广东进攻福建、浙江，由战功升任师长。次年3月，东路军占领南京后，卫师奉命移师镇江。8月底，盘踞在苏北的孙传芳部进攻南京，

此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形势吃紧。卫部与孙部展开激战，取得了龙潭战役的胜利，稳定了南京的局势。蒋介石复职后，对于在龙潭战役立功最大的卫立煌没有提拔，却将刘峙、顾祝同提升为军长，一气之下，卫跑到上海休假去了。1928年冬，卫立煌任南京卫戍区副司令并被保送到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成为陆大特一期唯一带薪学习的学员。1930年初，石友三倒戈反蒋，南京空虚。蒋介石令卫立煌回安徽组织军队，组成第四十五师，卫任师长。次年，第四十五师扩编为第十四军，卫任军长，驻守杭州。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卫立煌为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十师和第八十三师于8月上旬向河口镇进发，适逢红军向黄安转移，卫部占领河口镇后，又向黄安进击，当晚被红军包围。卫亲率装备精良的特务连拼死抵抗，才免被红军俘虏。

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受挫以后，各部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蒋介石采用重赏的办法，明令各部：先占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政中心金家寨的，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9月上旬，卫立煌奉命策应受阻的陈继承部。由于红军主力已西撤，留守的部队数量较少，没做过多的抵抗就主动撤离，卫立煌率队尾随，乘虚占领了金家寨。蒋介石得到卫部占领金家寨的电报后，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问。除给卫巨额金钱奖励外，还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的商城、固始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者，在此之前只有一个中山县。立煌县的设置，使卫立煌声名大噪，也为国民党其他军官所忌妒。

1933年12月，卫立煌又奉命参加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任赣江“清剿”总指挥，受前敌总指挥陈诚节制。不久，“闽变”开始，蒋介石需要像卫立煌这样能打仗的人，任命卫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辖五个师由江西抚州经闽西北、沿闽江顺流而下，直达福州外围。当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宣布解散后，卫立煌又在闽江以南设伏截击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退到泉州的部队被围后，卫派人到泉州达成第十九路军接受改编的协议。蒋介石对卫的表现非常满意。1935年11月，卫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加封卫陆军上将衔。

西安事变爆发时，卫立煌等人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在此期间，周恩来把他当作重点团结对象，做了很多工作，卫立煌开始意识到要抗击日寇，国共两党必须合作。1937年春，卫立煌在安徽六安同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毅亭谈判，达成了红军改编协议。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卫立煌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鉴于平津危在旦夕，卫主动请缨北上，驰援第二十九军。7月底，当他们还在北上途中，平津已陷落。8月初，卫率第十四军增援汤恩伯部防守南口，遇到日军阻击，双方互有胜负。在距南口还有一天路程时，南口已经失守，卫立煌所部再次失去增援目标。此时，沿平汉路南下日军连下房山、涿州，平汉线告急。卫立煌所部利用山地形势，从日军间隙中穿行，采用灵活的战术，冲出重围，到达指定地点遂城镇，准备参加保定会战。但由于负责平汉路战事的刘峙不战而弃保定，引起全线崩溃，保定会战计划落空。卫奉命沿平汉路西侧继续南撤，昼伏夜行，涉唐河、大沙河，抵石家庄集结待命。

沿平绥路西犯之日军在占领了南口后，继续向西进占张家口，分兵直扑内长城各关口：一路沿怀来、蔚县、广灵、灵邱进攻平型关，一路由浑源、应县、山阴进攻雁门关；另一部继续沿铁路西进，进占柴沟堡、天镇，9月13日陷大同，晋绥军内长城防线崩溃，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派卫立煌驰援山西。10月初，卫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率部开到娘子关。卫先到太原与阎锡山会面，商讨作战计划，并见到了周恩来和朱德总司令。10月上旬，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在忻口阻击日军。10月7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忻口，战役开始。参加忻口会战的日军有五万多人，卫立煌指挥的部队共计十多万。卫立煌经和阎锡山、朱德总司令协商后，决定组成左、中、右三个兵团，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阻击日军。

忻口战役开始后，双方争夺得异常激烈，许多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又失。激战至31日，日军始终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战事处于胶着状态。正当卫立煌准备从左翼向日军发动攻势时，沿平汉路南下之日军一部，在晋东突破了娘子关防线后，自东向西进攻太原，不仅太原告急，且在忻口作战之部队也将腹背受敌。在万般无奈之中，卫立煌只得下令撤退，向太原靠拢，忻口会战结束。忻口战役后，卫部尚未来得及部署，日军即向南切断了太原与晋南的通路，南下日军猛攻太原。11月9日，太原失守。卫立煌只得率部到介休、孝义一带构筑工事，与敌对峙。

1937年11月，最高统帅部发表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阎锡山见自己的力量已经丧失，其他系统的军队他又指挥不了，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卫立煌。卫立煌认识到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战斗精神及军民关系都优于国民党军队，在大敌当前，晋南形势岌岌可危之时，如果不和八路军合作，第二战区的抗战就很难坚持。于是，他开始寻求同共产党合作。抗战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卫立煌带着他的两个军长李默庵和郭寄嶠从临汾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给朱德总司令拜年。总部为卫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1938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了4个师团10多万人，由太原南下，企图一举攻下晋南。2月17日，第二战区负责人阎锡山、卫立煌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临汾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御敌之策。卫立煌认为日军南下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而我军当采取持久战略，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吕梁中条山和敌后。他与阎锡山、朱德研究确定，将阻击点选择在临汾北面的韩信岭一带，构筑防御工事，采取阵地战的办法，进行了继忻口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阻击战开始后，双方争夺很激烈，日军不能从正面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乃以主力继续向韩信岭正面阵地猛攻，分兵一部向隰县前进，企图从左翼实施包抄。卫当即令守军全线反击，战斗更加激烈。

卫部在韩信岭坚守了十天，战略目的已经达到，遂令部队向中条山转移。当他率指挥部渡汾河与主力部队会合时，汾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日机炸毁，又遭日军追击，幸亏八路军派部队顽强顶住日军的进攻，才得以脱险。4月，他假道延安，经西安到达中条山之垣曲县，与主力会合。

1939年1月，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月，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这一时期，正是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转变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11月，在第一战区辖区内，发生了“确山惨案”，全国为之震惊。卫立煌盛怒之余，将南阳专员朱玖莹撤职，把负有责任的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别廷芳传到洛阳关禁起来，取消民团预备队。12月中下旬，晋西发生了“十二月事变”，在阎部遭到抗日决死队反击时，卫立煌严守中立，使阎在晋南的部队损失十之七八。蒋介石决不允许八路军在晋南立足、发展，一面下令八路军撤出该地区，一面令卫立煌向八路军发动进攻。在蒋的严令下，卫立煌只得召集部下做好战斗准备，私下却与朱德谈判，划定各自的防区，避免了一场战争。1940年初，军事

委员会任命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3月，朱怀冰率九十七军进攻太行地区的八路军总部，遭到反击，向卫发急电求援，卫置之不理。

1941年3月，卫立煌奉令回重庆述职，蒋介石对卫的第一战区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的做法进行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政府主席之职。卫一气之下，请假到峨眉山休息。5月，日军集中15万人向中条山发动进攻，蒋介石派何应钦到西安改变了卫的部署，使得日军攻占了垣曲县黄河渡口，对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形成包围之势。卫在峨眉山得知战事吃紧，急匆匆赶回洛阳，指挥部队从敌人薄弱处钻出包围圈，向敌背后进攻，迫敌停止军事行动。事后，卫立煌指责何应钦改变了自己的部署，导致中条山作战失败，而蒋介石却要卫承担失败的责任。

1941年1月，卫被革去二级上将军衔。随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之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被剥夺了兵权。

卫在西北行营坐了两个月冷板凳。3月6日，他突然接到蒋的电话，要他带领远征军入缅。9日，卫到达重庆。12日，蒋通知卫，要他出任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就在这时，原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被戴笠收买叛变，和盘托出了卫与八路军的关系。蒋得知后，改由罗卓英出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卫只好回成都闲居，奉养老母。

1943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在盟军的强烈要求下，卫立煌再度被起用，蒋介石把卫召到重庆，恢复上将军衔，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到达远征军指挥部后，一改陈诚的部署，将指挥部由云南的楚雄向前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仅有70公里的保山县，并积极作好反攻的准备。在远征军中，不管是中央军，还是杂牌军，他能够一视同仁，把原东北军的五十三军全部换成了美械装备，使将士深受鼓舞。

当时，在缅的日军共计九个师团，利用滇缅公路的各个要点筑工事扼守。卫立煌研究了敌情后，制订了反攻计划。1944年5月11日，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命令。由于准备充分，远征军将士用命，至21日，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威胁敌之战略要地腾冲，完成了初期反攻的任务，声震中外。美国的《时代》杂志对此做了专题评论，封面上刊登了卫立煌的照片，称之为“常胜将军”。

强渡怒江后，卫立煌根据敌情，调整部署，将所部分为左右两个集团，并请求盟军战机配合。6月1日，全面反攻开始。战至20日，右集团军先

后攻占了北斋公房、瓦甸、明芝、东固街等地，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占了腊孟街和领安街。8月中旬，右集团军攻占腾冲。10月下旬，左集团军攻下松山。随后左右两个集团军会合，继续乘胜追击，于11月初攻占龙陵，中旬克芒市。1945年1月占畹町，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友，中印公路被打通。为此，卫立煌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的最高奖赏。

中印公路打通后，中国远征军长官部改组为陆军总司令部。卫立煌满以为总司令一职非他莫属，结果他成了总司令何应钦的副手。卫对这个任命非常不满。他以就医为名，不就职，不办理移交手续。全面内战爆发前，他主张对中共问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这同内战的叫嚣是格格不入的。1946年11月，蒋介石安排卫立煌出国考察军事。

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了他的十国考察之后飞抵上海。蒋介石立刻召见他，向他介绍国内的局势，询问他对东北局势的看法。不久，蒋介石通知卫出席军事会议，想让卫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卫当即予以回绝。此后，顾祝同、张群也来劝卫，也遭拒绝。

1948年1月，南京政府明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并在报上公开发表。卫不得已，只好飞抵沈阳。

卫立煌到东北后，着手收拢部队，集中力量，固守要点，并注意对部队补充训练。对于东北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他都持这样一种态度：集中兵力，固守沈阳。所以尽管解放军攻击新立屯、辽阳、法库、盘山、鞍山等城市，各地守军将领纷纷告急，请求援助，蒋介石也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围，他总是将主力集中沈阳，按兵不动。5月，蒋介石决心撤退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卫则认为：沈阳主力若单独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绕河三条大河侧敌行动，有被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若要撤退沈阳主力，应多派军队到锦州，向东打通沈锦交通，待沈、锦两地军队会合后，一同北上，将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议撤退之事。围绕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蒋、卫之间发生了矛盾。最后，蒋同意沈阳主力暂缓撤离，但须做好准备，待抽调部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东北解放军主力突然奔袭北宁线，将锦州围起来，关上东北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锦州被围后，蒋介石慌了手脚，召卫立煌到南京，令其出兵辽西，解锦州之围，夹击解放军。卫不同意蒋的意见，认为锦州之围应由关内增援部队解决。蒋介石坚持沈阳主力应尽快出兵辽西，并派顾祝同随卫到沈阳监督执行他的命令。